

董必武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贡献

张光宇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董必武担任过中共汉口地委书记、中共湖北区委委员(负责国民运动)、中共湖北省委委员(负责国民运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委和常委、湖北省政府常委兼农工厅厅长、《楚光日报》和《汉口民国日报》经理、湖北省立中小学教师党义研究所所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成员、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成员、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等职务。他从事的革命工作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从事国共合作的工作,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主持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工作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是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董必武筹建和主持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他回忆说,在湖北组织国民党,“我搞得多”,“实际我是头头”^①。董必武不仅是湖北共产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也是湖北国民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

1923年6月,中共“三大”确定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之后,中共中央于11月发出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指示湖北等地方组织领导建立国民党地方党部。1924年4月,在共产党人的主持下,国民党湖北临时省党宣告成立,董必武当选为执行委员。虽然临时省党部机关不久即遭到军阀破坏,但随着国民会议运动和追悼孙中山的活动在全国的开展,“临时省党部公开在各方面活动,造成多次群众运动”,一些县市国民党组织也开始建立起来了。

在这种有利的革命形势下,中共汉口地委书记董必武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领导湖北的革命统一战线工作,负责筹建正式的省党部。经过积极的筹备,1925年7月15日至20日,在武昌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组织及纪念、教育及宣传、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商人运动及一般国民等问题决议案,大会选举正式执行委员9人,候补执行委员5人,正式监察委员5人,候补监察委员3人,正式成立了省执行委员会和省监察委员会,省执行委员会设立秘书处(常务委员3人)、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工人部、青年部、妇女部以及农民运动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董必武当选为正式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负责人”^②,实际上主持省党部的工作。

1926年1月,董必武出席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他参加了提案审查委员会,作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报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他根据国民党中央的决定,以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常驻湖北,指导湖北国民党的党务。

为了加强国民党的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国民党领导机构的作用,推动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在董必武的领导下,湖北省党部成立后又先后召开了三次全省代表大会。1926年2月,

召开了省“二大”，大会健全了省党部的工作机构，扩充正式执行委员11人，候补执行委员7人，增设了商民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和临时指挥部。同年7月，召开了省“三大”，大会通过了多种决议案、宣言和通电，选举正式执行委员11人，候补执行委员7人，正式监察委员7人，候补监察委员5人。1927年1月，召开了省“四大”，董必武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他在开幕词中说明了大会的主要任务，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有许多幼稚同志，以为现在晋、陕、浙、贵克复，就是革命的成功，殊不知要使中国一切经济政治均不受外人束缚，然后才算成功。”他阐述了开展农民运动的重要性，最后他说：“总之，须使湖北成为革命的湖北，至方法如何，则为此次大会应负讨论及督促之责任”^③。大会发表了宣言、通电、告民众书，通过了政治报告、党务报告、省民会议、中央联席会议代表报告、对英问题、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禁烟问题等决议案。大会选举正式执行委员15人，候补执行委员9人，正式监察委员9人，候补监察委员7人。在三届一次会议上，选举了常务委员、秘书长以及各部部长。董必武当选为正式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省党部的成员中大多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为主而组成的民主革命联盟。在会上，董必武致了闭幕词，指出这次代表大会有农民代表参加，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是比前几次代表大会进步的地方，他号召说：“希望各同志回县遵照议案一一施行，庶不负此次一百八十余代表之讨论。”^④这次代表大会在省党部的历史上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在大会精神推动下，全省党务有了很大的发展，到5月底止，全省有党部组织的县市发展到74个，全省党员达9万余人。

湖北省党部的建立，国民党组织建设的加强，起到了巩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组织基础的作用。

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工作中的成绩，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称赞，中央指出：“湖北党部的国民运动颇能努力进行，在国民党中央完全占有主持的地位，领导群众的政治运动，均有相当的成就。”^⑤

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说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中没有完全掌握领导权，那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中是牢牢地掌握了领导权的（许多省份都如此），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在组织形式上的一个特点。如果说许多省份的省党部成了当地革命斗争的指挥部，那么，湖北省党部的这种作用就更明显了。湖北省的许多革命斗争是由省党部出面指挥的，加之，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武汉之后，又常常与湖北省党部在一起共同指挥斗争，因此，董必武主持的湖北省党部的重要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二、创办《楚光日报》和《汉口民国日报》

为了加强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工作，董必武先后创办了《楚光日报》和《汉口民国日报》。

董必武从1925年10月起就着手筹办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1926年1月，董必武趁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的机会，亲自为办报筹集经费。董必武的主张得到国民党中央的支持，在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会首届会议上，国民党中央鉴于湖北省党部还没有自己的机关报，即决定委派董必武回汉筹办，并拨给2000元活动经费。经过董必武的积极筹备，《楚光日报》于1926年3月24日正式创刊，董必武化名亲任经理，宛希俨（共产党人）任主编。

《楚光日报》是四开的小型日报。董必武认为，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必须先让

《楚光日报》“求得存在，站住脚跟，取得阵地”，工作要一步一步地开展，不能急于求成。如果报纸一开始就亮出共产党的全盘主张，肯定很快就会被封闭，必然是欲速不达。因此，他启用《楚光日报》这个较灰色的名称，报纸开始并没有把共产党的主张完全拿出来，只是在个别观点上反映共产党的一些原则。当然，《楚光日报》仍以崭新面貌出现，独树一帜，坚持反帝反封建的办报原则。1926年6月9日，它以头条位置刊登了“汉口各界汉案周年纪念大会”的启事。《楚光日报》还以显著位置刊出了汉口“六·一一”惨案纪念宣传大纲，提出了“收回租界”、“撤销领事裁判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严惩杀人凶手”等口号。它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揭露军阀吴佩孚对湖北人民横征暴敛、敲诈勒索的罪行，痛斥那帮军阀是“以剥夺人民脂膏为职志的官吏们”。它还通过新闻报导，揭露各省军阀为了瓜分地盘，拥兵自立，竟不顾人民死活，肆意滥发纸币，实行盐斤加价，结果造成官票贬值，“各省财政，多已到了破产地步”。

《楚光日报》以它鲜明的革命立场，通俗易懂的文字，形式多样的版面，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报纸发行量最多达7000余份。同时，它也引起了湖北反动当局的仇视，1926年7、8月间，报纸两次被封闭，主编宛希俨、编辑夏筠被拘捕，后经营救出狱，报纸被迫停刊43天。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楚光日报》复刊，此后，旗帜鲜明地宣传革命主张了。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9周年纪念日，《楚光日报》出了一期《十月革命纪念增刊》。董必武发表了《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一文，歌颂十月革命“好象一声春雷，把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从痲昏睡中唤醒”，号召民众学习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毅然决然加入反帝国主义战线，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进攻”。

1926年9、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楚光日报》交给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主办，董必武另行创办了《汉口民国日报》。《汉口民国日报》起初由总政治部、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共同筹办，董必武担任经理，宛希俨、高语罕、沈雁冰（均为共产党人）先后担任主笔。该报创刊于11月25日，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迁来武汉后，改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合办。次年3月底以后成为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

《汉口民国日报》规模较大，出对开三大张，新闻占六版。第一张有两版，第一版是社论、国内要闻和特载等，第二版主要是国际新闻。第二张也有两版，一版刊载外地消息，下有党务消息专栏，另一版登载外国有关我国的言论以及国内通讯特写等。第三张也有两版，一版是本省新闻、本市新闻和农工消息。另一版为经济版，内容有经济论评、经济要闻（外地经济消息）、金融消息、本埠商情、经济常识。在第三张用半版篇幅办了“国民之友”特刊，在新闻中配有新闻照片。

《汉口民国日报》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土豪劣绅的罪恶，批判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破坏革命的阴谋活动，忠实地记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反帝斗争等方面的情况。由于大量刊登工农运动的消息，引起了陈独秀的恐惧。陈独秀曾找主笔沈雁冰谈话，指责《汉口民国日报》太红了，不要再登工农运动的消息了。沈雁冰向董必武请示怎么办，董必武坚定地回答说：“不理他，我们办我们的！”^⑥

《汉口民国日报》不仅由共产党人具体主办，而且编辑方针也是受中共中央宣传部瞿秋白、蔡和森指导的，可以说，它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直接领导的一份大型日报。同时，该报由于办在临时首都武汉，又受到总政治部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指导，经常发表一些指导全国革命斗争的社论，所以，它又成了全国性的报纸。

为了加强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研究和宣传，董必武还创办了《湖北省立中小学教师党义研究所》，亲自兼任所长。该所在1927年上半年先后办了两期，招收研究员共600余名，开设了《社会进化史》、《各国革命史》、《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不平等条约》、《教育政策》、《青年运动之意义与方法》、《群众运动及其心理》等课程。

《楚光日报》和《汉口民国日报》以及《党义研究所》的创办，宣传反帝反封建的主张，起到了巩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的作用。

三、主持湖北省政府的工作

湖北省政府是国共合作的政府，董必武是省政府的实际主持人，他回忆说，我是“湖北省政府负责人”⑦。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议正式组织湖北省政府，并邀请共产党人参加政府。经过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湖北省党部协商，决定由董必武担任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长。4月10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发布了这一任命。省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董必武为常务委员。4月14日，湖北省政府宣告成立，武汉人民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湖北省党部对省政府“希望甚大”，提出“省政府是党指挥监督的政府”，“省政府是廉洁的政府”，“省政府是革命的政府”，“省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省政府是铲除封建，建立民主政治的政府”，“省政府是发展工农运动，解除群众痛苦的政府”。

湖北省政府是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革命政府，省政府农工厅在保护工农利益方面作了不少工作，比如，5月22日，农工厅根据沔阳县县长的报告，向省党部提出决定没收土豪劣绅资产办法案，省党部第37次常委会决议依照没收逆产条例办理。当时，武汉震华纱厂等资本家无故停工，致使大多数工人失业。5月下旬，农工厅长董必武根据震华纱厂工会的要求，向该厂厂主发出命令说：“本厅长负有保护工商业之责任，为使工商业者与农工同时获得一致之利益起见，限于令到三日内，即行照常开工，勿得观望迟疑，致于咎戾。”⑧

由于大革命后期，革命的中心由广州转移到了武汉，所以，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对湖北省政府的成立十分重视，在某种意义上说，湖北省政府的重要地位，是别的省份无法比拟的。

董必武参加湖北省政府的工作是有一个过程的。过去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以“在野党”自居，反对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的工作，所以，1926年9月，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成立时，湖北的国民党左派曾建议董必武参加省政府工作，但中共湖北区委负责人，由于受到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影响，未能采纳这一建议。10、11月间，中共湖北区委和中共中央在酝酿湖北省政府委员人选名单时，也没有包括共产党人。但是，1926年11—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作出下列决议：“为了加强在国民党内的活动，以促进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共产党人应该参加广州政府”。“共产党人应该参加广州政府，以便支持革命左翼反对右翼软弱和动摇政策的斗争。”⑨次年1月，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决议之后，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第一次明确承认了“二次革命论”的错误，同时认为“加入国民政府”“是相因必至的问题”⑩。于是3月间，在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统一革命势力案》决定：“共同担负政治责任问题——应由共产党派负责同志加入国民政府及省政府”⑪。董必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参加省政府工作的。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产党人参加革命政府的工作，掌握政府的领导权，是实现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董必武不仅

在理论上对革命政权的性质有所阐述，他说：“民权主义，即实行革命民众的政权”^⑫，“革命政权归革命民众，政权操于大多数之手，而不操于一阶级之手，这是与各国革命不同的，”“向非资本主义方面发展，此为真正三民主义之真义”^⑬。指出了国民革命所要建立的政权与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权的本质区别。而且，他在实际行动中，牢牢掌握省政府的领导权，促使它沿着革命的方向发展。

四、指导湖北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董必武参与指导了湖北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1924年9月初，在全国反帝国主义运动周中，武汉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宣告成立，并召开代表大会，董必武、陈潭秋等15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反帝大联盟是一个进步的群众性的联合组织，参加的成员比较复杂，但由于共产党人参加了联盟的领导工作，使它能够沿着正确轨道前进。9月7日是“国耻纪念日”，由武汉反帝大联盟发起，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帝游行示威，各界群众齐集阅马厂召开大会，散发《“九七”告国民书》，指出：“九月七日是我国国民受国际帝国主义侵略的国耻纪念日”，“消灭国耻的方法，只有赶快的团结起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⑭。

1926年7月，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中，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在北伐战争前夕，根据国民党中央的决定，湖北组织了以董必武为主席的特种委员会，搜集敌人政治军事情报，扰乱敌人后方，策动敌军起义，配合北伐进军。董必武亲自进行或领导开展对唐生智、刘佐龙、陈尧鉴、宋大霈等的策反工作。北伐军进抵长沙后，董必武代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赴湘迎接北伐军进军湖北。

武汉被北伐军攻克后，工人运动出现了以发展组织、经济罢工为主要内容的工潮。但遭到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攻击，他们指责工人运动“幼稚”、“过火”。为了支持武汉工潮，12月28日，董必武领导的湖北省党部却发表《最近武汉的工潮真像解释》一文。文章分析工潮的原因是“工人阶级的觉悟”，“工资太低”，“物价高涨”，“铜元低落”。文章明确指出：“未及两月，成立工会300余个，组织工人将近30万，这是工人阶级觉悟及其团结力的表现，虽有许多过渡时期难免的幼稚现象，但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的怀疑工人组织及本党农工政策。”“吾们决不可因工潮而怀疑或恐惧工人阶级势力的发展，而自乱其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⑮。

1927年1月3日，英帝国主义制造汉口“一·三”惨案后，董必武主持的省党部第四次全省代表大会于6日发出通电表示：“本会誓本不妥协之革命精神，与英帝国主义者作殊死战，收回英租界，对英经济绝交，实行为死难同胞复仇，深望一致努力，坚持到底，以争得最后之胜利”^⑯。7日，代表大会为“一·三”惨案在阅马厂举行武昌市民对英大示威，到会群众20余万人。董必武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身份担任大会总主席，他在报告中号召说：“现虽英租界收归，我政府派军警管理，而束缚我们之一切不平等条约尚多，英帝国主义者仇视我们民族益甚，所以，我们要求生存，就要于今日大会集中力量，续死难同胞精神，以与英帝国主义者奋斗。”^⑰为收回英租界后继续反帝斗争指明了方向。

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的发动和参加，是国民革命胜利的基础。董必武参与指导了湖北的农民运动。他在省党部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革命，是民主势力向封建势力革命，封建制度的铲除，不仅在打倒军阀，还要打倒封建制度

的基础土豪劣绅，但是达到上列目的，必须普遍农民运动。国民革命是要大多数的民众参加，中国最多是什么，就是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此为今后党务应注意之点”^⑱。为了打倒土豪劣绅，支持农民解放，在董必武主持下，3月6日省党部第15次执委会议讨论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草案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草案，决议呈报中央党部核准后，交省政府公布施行。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董必武提议说：“湖北省党部拟出之惩治条例，足以保护农民运动，因为土豪劣绅之犯罪，为普通法律所不能及，应从速颁布”。在毛泽东等人的支持下，全会批准了这两个条例草案。^⑲4月初，当麻城县土豪劣绅利用红枪会制造“麻城惨案”后，董必武立即召集会议，决议由省党部、省政府、省农协、中央农民部、军事委员会以及麻城农民代表组织查办麻城惨案委员会，前往麻城调查处理，平息反革命武装暴乱。

五、参加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为了巩固国共合作，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董必武旗帜鲜明地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1925年7、8月间，国民党新右派的“理论家”戴季陶先后抛出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等反动小册子，反对阶级斗争和国共合作。湖北省党部宣传委员会发表了“纠正戴季陶所著‘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文件，组织了“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的报告会。

1926年1月，西山会议派张知本、居正、石碇声称：“湖北省党部为共产党所把持，应即依照决议，将该部解散，重新登记”。在董必武指导下，湖北省党部发表启事，驳斥了西山会议派的谬论，严正声明：“本省党部系受命于本党最高机关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合法组织，集合革命同志，以领导革命民众努力于本省之国民运动为职责，只知遵守党纲，服从纪律，刚强淬励，不畏暴逆”^⑳。与此同时，在国民党“二大”上，董必武发言主张开除居正的党籍，大会决议通过开除居正的党籍^㉑。

同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篡夺军权的“中山舰事件”后，湖北省党部宣传委员会组织了“中山舰事件”的报告会，省党部第三次代表大会也谴责这一反共事件。

1927年1月，当湖北省党部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之际，蒋介石从南昌来到武汉，在选举新的省党部时，企图利用圈定的方法，由他圈定多人，以达到篡夺省党部领导权的目的。但是，在董必武的指导下，“省代表大会迅雷不及掩耳地把代表大会开定”，利用大会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了新的省党部。

当蒋介石制造“赣州惨案”、“南浔惨案”之后，3月下旬，在董必武的领导下，省党部呈请中央党部“先免蒋总司令本兼各职，再行议处。”4月初，省党部又呈请中央党部“迅予免去蒋介石本兼各职，并宣布罪状，开除其党籍”。

4月4日，董必武在省党部纪念周会上，作了《我们目前两个大斗争》报告，指出：“张作霖也表示与蒋介石合作了！只希望蒋介石打击彻底派，打击农工群众，同时留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生命，并且帮助帝国主义打击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他做一件，帝国主义及军阀鼓掌赞成一件，同时便替他在国际间反宣传一次，他们利用蒋介石的方法，与利用张作霖、孙传芳是一样，而蒋介石甘愿受他们的利用，也与张作霖、孙传芳是一样”，因此，“要打倒帝国主义，先排除妥协分子”^㉒。这就实际上指出了这时的蒋介石已成了革命的最主

要、最危险的敌人，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4月15日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董必武针对汪精卫等人对蒋介石的暧昧态度，首先提出：“务希中央毅然决然加以处置，以申党纪”。这个意见得到与会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会议决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各级党部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②。与此同时，省党部也发出通电，呈请中央党部“调遣军队，严加制裁”。在历史转折关头，提出调动革命军队东征讨蒋的主张，是与周恩来的“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主张一致的，是符合革命形势发展需要的，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在反动军官夏斗寅叛变革命、偷袭武汉的危急时刻，5月18日，董必武主持的省市党部执监联常会议通电声讨夏斗寅。19日，武昌、汉口和汉阳的各界群众分别召开了声势浩大的讨夏大会，董必武在武昌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讨夏便是讨蒋的一部分”。^③

5月下旬，当汪精卫集团发布一系列压制工农运动的反动训令的时候，董必武明确表示：“对于三大政策，当然应坚持拥护”^④。

当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之际，董必武毅然决然辞去一切职务。

董必武反对国民党右派斗争的鲜明态度，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反映了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思想。

综上所述，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董必武在巩固国共合作的组织基础、政治基础、思想基础、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等方面进行了很多工作，不愧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一位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同时，也可以看出，董必武的革命活动的意义已超出了湖北的范围，而带有全国性。他的历史功绩，将永远载入史册。

注释：

① 田海燕记董老谈话(1961年)，抄件存武汉市文物管理处。

②⑦ 董必武简历，抄件存湖北省博物馆。

③⑩ 1927年1月5日《汉口民国日报》。

④ 1927年1月15日《汉口民国日报》。

⑤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⑥ 沈雁冰：《一点回忆》，载《忆董老》，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⑧ 1927年5月27日《汉口民国日报》。

⑨ 载《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⑬ 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⑪⑫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速记录。

⑬ 1927年5月11日《汉口民国日报》。

⑭ 1927年6月9日《汉口民国日报》。

⑮ 1924年9月10日《湖南大公报》。

⑯ 1926年12月28日《汉口民国日报》。

⑰⑱ 1927年1月8日《汉口民国日报》。

⑲ 1926年1月8日《湖南大公报》。

⑳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速记录。

㉑ 1927年4月5—6日《汉口民国日报》。

㉒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速记录。

㉓ 1927年5月19日《汉口民国日报》。

㉔ 1927年6月8日《汉口民国日报》。